

以“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上接1版）——“科学家精神”进一步弘扬，在祖国大地上撰写科技论文。从钱学森、邓稼先、罗健夫、蒋筑英，到黄大年、钟扬……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重大的创新突破背后，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默默奉献。

从青藏高原生态恢复到新疆地区棉花生产，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在棉花种植的田间，科研工作者用坚守和创新，铸就了属于人民和土地的科技创新成果。这些硕果，不由白纸黑字写就，而是借用信仰铸就的如椽巨笔，撰写在祖国大地上，撰写给全体人民。

——“千里马”竞相奔腾，科技人才激发创新活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大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近年来，在诸多院士专家的共同建议下，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科学家如何既有“面子”更有“里子”等一系列问题，坚持用简政放权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的“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创造的热情，激活了万众创新的“一池春水”。

助推“中国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存在。

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落后。没有一招鲜、几招鲜，没有参与或主导新赛场建设的能力，就会缺少机会。

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如今，站在新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科技梦”的助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加快科技研发，掌握竞争先机。

“中国的‘科技梦’已经是好多代科技工作者的梦了。”40年前，彼时还正值壮年的战略科学家、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参加了那场激动人心的全国科学大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他眼中仍会泛起激动的目光。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认为，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精尖技术”，中国必须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面向未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要的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

——增强创新源头供给，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认为，必须让创新人才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上不断突破，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解好创新驱动“发展方程”，紧握科技改革“点火器”。王志刚指出，要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双轮驱动”，把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才奠定了国家的今天，现在的科技工作者们更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的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不记名、不为利，真正为国家振兴做贡献。”徐匡迪说。

“道不可坐论，事不能空谈。”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新号角，站在新起点，研究提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立项建议、审议通过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一系列引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磅规划和方案密集出台，清晰定位科技创新供给新坐标。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时代，乘着改革与创新的浩荡东风，汇聚各方力量，我们一定能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奋力拼搏、自强不息，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一年为群众止损近20亿

（上接1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队长臧学民介绍，2017年该局打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为群众止损19.8亿元，劝阻群众近4万次，破获北京市及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及抓获犯罪嫌疑人分别同比上升50%和30%。2017年，北京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总量降至5年来最低。

便民改革措施让群众少跑腿

受理异地办证38.6万件，累计为群众节约时间5.8万小时——这是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措施的数据。

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围绕户籍、出入境、交通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相继推出了30项便民改革措施。

在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办事大厅，不少市民发现，这里也可以使用便捷的手机移动支付。今年年初，出入境管理局全面升级缴费系统，推出全业务、多码合一扫码支付便民服务，内地居民、港澳台居民均可扫码缴费，除了微信支付，还可使用支付宝、京东App等多个平台。

“网上北京市公安局”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快。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互联网+警务”已经整合了与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43项公安业务，全年办理各类业务700万份次，“北京交警”“掌上119”等平台，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事流程、申请办理业务、查询办理结果。根据第三方调查，受访群体对消防行政审批满意度为94.4%，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达到96.6%。



4辆摩托车 25万公里，能绕赤道5圈 24年的坚守，青山无言埋忠骨

村民吴国亮前一天从河北邯郸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好多趟中巴才赶回大山，就为了看卓彦庆最后一眼。他红着眼喃喃自语：“半个月前给你电话说贷款的事情，我会好好计划自己处理好的。以后，村民的百家事你不要都揽在身上的，请好好休息吧。”

村民黄雪土在出殡那天清晨4点40分就从60公里外的建德一路赶来。他说，在外打工20多年，家中老母亲多亏卓书记照顾，恩情不知如何回报。

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力山，为卓彦庆送行。在乡党委的档案柜中，存放着卓彦庆的14本工作笔记和16本党支部工作手册。

1994年的工作笔记：开办竹笋两用林培训以及好活动和前途；1996年的工作笔记：种植竹笋两用林1570亩、消灭荒山654亩、种植杉苗17万株……2016年的工作笔记：鼓励村民发展农家乐……

24年的工作笔记串起来，就是大力山村发展的轨迹。工作笔记中还记录着他的感受：“讲原则，讲诚信，不能做老好人，亲戚归亲戚，朋友归朋友，有些事不能轻易答复，也不好随意改口……”“村民的事不是小事，自家的事可延误几天，村民的事可不能耽误。”

24年的工作笔记串起来，就是一个中国最基层党员干部的精神图腾。“跑腿书记”跑累了，但“跑腿精神”还会越跑越远。石佛乡驻大力山村的乡干部范嘉豪说，作为驻村干部，他定会传承卓书记的精神，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守护大力山的百千村民和一草一木。“你的跑腿业务”大家会接着跑；未种上的黄茶苗，他们也会接着种。”巫国林说。

灵车缓缓从山上驶向山脚，脚下这条路卓彦庆花了18年的心血。村民们说，“阿土”书记用大半辈子守护了大力山，今后就由这座青山来守护他。

在他的带动下，大力山村村干部队伍拧成一股绳，领着村民种植高山油茶、高山黄茶等上千亩。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万元，村里摘掉了贫困的帽子。2015年，卓彦庆被评为浙江省“千名好支书”。

“群众动嘴，干部跑断腿。”受到过“跑腿书记”帮助的人在村里比比皆是。当地政府做过测算，24年来，卓彦庆为村民办事骑坏了4辆摩托车，跑了近25万公里，能绕赤道5圈。

近年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村干部纷纷当起了代办员，石佛乡党委组织委员金拯说，在大力山村，摩托车几乎是村干部的“标配”，这些年在卓彦庆的带领下，大力山渐渐多了“跑腿主任”“跑腿村委”，甚至还带动了整个石佛乡的“跑腿氛围”。



▲吴国良随身的公文包。

专业的吴国良甚至专门报了四川一所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网络班。

“他说要多学专业专业知识，不然自己都不懂，怎么去指导别人？”同事周有才说，“我问他怎么不报个函授班，还可以隔三岔五到昆明上课，休息休息。他对我说，工作那么多，还是在网上上课节省时间。”

就像他没走一样，继续战斗下去

“国良，这件事情你来办一下。”@吴国良”周明在微信工作群里发出这条信息后，才意识到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已经不在在了。

整个微信群沉默了很久，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总觉得他没有离开。”年轻同事杨钦说。在镇政府五楼，吴国良办公室门口挂着的“干部工作去向牌”上，标注的状态仍然是“下乡”，而他的办公桌已落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前段时间我俩还在聊，这两年我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很有成就感，老百姓盖起了新房子，产业发展也有了眉目。”周明说，“我俩还规划着，等脱贫后要继续提升乡镇软实力。”吴国良去世后不久，他兼任村支书的中河村村干部们聚到一起，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跑腿书记”

他是带领村民开路的“愚公”，用18年修通一条29公里的机耕路，连接22个自然村，从此大山不再与世隔绝

他是村民最信赖的人，不少年纪大的村民要取钱，干脆把存折交给他保管，连密码都告诉他

24年来，卓彦庆为村民办事骑坏了4辆摩托车，跑了近25万公里，能绕赤道5圈

本报记者魏董华、方向禹

清晨6时，远处的群山依然笼罩在一片云蒸霞蔚中。朝阳的暖色渐渐洒向送葬的人群。这是卓彦庆最后一次“走”出大山。灵车后送行队伍沿着蜿蜒的山路，不见首尾。白色花圈在群山翠林间，每个人脸上写满了哀伤。

173个弯道，63个涵洞，29公里路，在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石佛乡大力山村，送行的村民多么希望，卓彦庆只是“跑累”了。

他是个这样的人

“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力山村民，30岁的时候当了大力山村党支部书记，一做就是24年。”79岁的村民叶元珠说。“阿土”是他的乳名，上了年纪的村民总爱唤他“阿土书记”。

“他是带领我们开路的‘愚公’，认准一件事坚持干下去。”大力山村村支委巫国林是卓彦庆的老搭档，“阿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前后18年，一条29公里的机耕路，连接22个自然村，从此大山不再与世隔绝。

“他是骑着摩托车给村民上山下山代办业务的‘跑腿书记’。”大力山村所属的塔石派出所所长严晓明说，虽然他调到塔石派出所只有4年，但他经常遇到来所里帮村民代办业务的卓书记。

“他是个一根筋的人，村民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还重要。”妻子廖美香说。出事那天，他和另外两位村干部跑了20多公里山路，从早上7点开始，一刻不停地测量农房，忙到连皮尺上的数字都看不清了，结果晚上睡前突发脑溢血病倒。

“他是村民的好儿子，我们最信赖的人。”村民王爱娥说，村子海拔高，村民居住分散，下山办事很不方便。多年下来，不少年纪大的村民要取钱，干脆把存折交给他保管，连密码都告诉他。

“他是一个群众发自内心爱戴的好村干部。”龙游县人民医院一位医护人员说，从卓彦庆突发脑溢血住院治疗直到去世期间，医院重症监护室门口、楼道都挤满了来看望他的村民和亲友。很多乡亲从早等到晚，站累了就在台阶上坐一会。

“村党支部书记说实话算不上什么‘官’，但在村民眼里，他在这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上干出了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村委会主任黄金土说。

18年29公里，大山里修“通天路”

一说到修路的故事，卓彦庆的老朋友、县交通运输局的徐烈就泣不成声，他说，卓书记几乎把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都花在这条路上。

卓彦庆刚上任那会儿村里没有公路，进出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环绕林间，有些上了年纪的村民一辈子也没去过40公里外的县城。

“由于交通闭塞，山里农特产运不出去，生活必需品则要肩挑手扛运回村里，外面的姑娘不愿嫁进来，村里的小伙很多成了光棍。”黄金土回忆90年代的大力山村时说。

“要想富，先修路。”一上任，卓彦庆就动员村两委，众人划桨开大船，“没钱，我们就自己动手；没设备，我们就用钢钎铁锤，每个自然村都必须都要通路！”

说到做到，村民告诉记者，卓彦庆当年在修路施工一线。在一次修路中，他的右手两根手指不慎被涵管压断进行了重植手术，术后他仍绑着绷带带领村干部们趁着雨季到来之前，抓紧抢修道路。长期下来，村里逐渐形成了好风气，每到修路时，党员一定准时到现场。

“开山辟路是大力山人几代人的心愿，但一直难圆。卓书记下的决心很大，开山第一炮那天，全村的劳动力齐刷刷扛着锄头大锤来到山脚，从此修路变成了村里头等大事，风雨无阻。”黄金土回忆说。

这条路是卓彦庆的牵挂。争取政策、现场测量、投工投劳……前前后后历时18年，终于，一条29公里的机耕路在崇山峻岭间打通，村民外出打工、求学方便了，村里的农产品也有了销路。如今，这条山间公路成为亚太汽车拉力赛道，每年都吸引世界顶级赛车手来此比赛。

副主任骆继超说，吴国良坠落的山崖有五六百米深，要不是半山坡上有几棵小树拦住，他的车子就直接坠到谷底了。被抬上来时，吴国良手还是热的，可心跳已经停止了……

“他从头到脚都是伤，头部伤得尤其重。”骆继超说，“他每天至少跑三四个村，一天下来要跑两三百公里山路，看得出来那天他很疲惫。”

身患重病，他坚守在扶贫一线

“想和他说说心里话都没机会了。”整理着吴国良的遗物，妻子李梅又一次忍不住哽咽起来。结婚四年来，吴国良夫妇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李梅说，这几年镇上扶贫工作繁重，吴国良是镇上的扶贫办副主任，还兼任中河村的村支书，她自己也是弯腰树村的驻村扶贫队员，两人平均两星期才能见一次面。

“我俩在镇上有一个宿舍，但已经好几个月都没回去了。”李梅说。

在吴国良位于东川区的家中，他的电脑桌上还摆放着一本“东川区脱贫责任书”和厚厚的一摞工作文件。在阳台的角落里，堆放着鼓鼓囊囊一大包还没拆开的药。

“2015年时，他在昆明查出患有慢性肾炎，这几年一直都是带病工作。”李梅说，医生要求吴国良每半个月要去昆明复查一次，但他没有一次按时去过，有时两个月都顾不上去一次。

因为经常不去检查，还总忘了吃药，吴国良曾因病情加重两次住院。“第二次住院是在2016年底，当时他去昆明办事，顺便去到医院复查，医生说你这情况必须住院了，他拗不过，才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李梅说。

“他平时嘻嘻哈哈的，为了不让我们担心，从来不提他的病情。”副镇长周明说，吴国良平时很开朗随和，但工作起来十分严谨。

为了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大学学物理

新华社记者庞明广

轰隆一声巨响，32岁的昆明市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干部吴国良连人带车坠入数百米深的山崖，再也没有醒来。

吴国良生命终止的这一天，距离国家级贫困县东川区计划的脱贫摘帽时间还有249天。整日奔波在贫困村寨的他，却没能看到乡亲们脱贫的那一天……

扶贫路上，他跌入数百米深山崖

4月26日，一个和往常一样忙碌的日子。天刚蒙蒙亮，汤丹镇扶贫办副主任吴国良便匆匆忙忙从镇政府出发，开始了一天的扶贫工作。这一天，他要走访大地坡村、达架村、三家村和酒海村四个村子，检查数十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兑付情况。

东川区是云南27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而汤丹镇是东川最贫困的乡镇之一。全镇境内峰峦叠嶂、山势陡峭，最高海拔达4288米。用副镇长周明的话来说，整个镇就像是挂在山梁上。

达架村是吴国良的老家，他的父母就住在村里。听说很久没回家的儿子要回来，吴国良的母亲早早准备好一桌饭菜。可中午在达架村检查完后，吴国良连家门都没进，立马奔赴下一个村。母亲追出家门时，只看到他远去的背影。

谁都没想到，这次擦肩而过，竟成为母子两人最后的诀别。

当天下午五点，吴国良走访完三家村的唐元龙老汉家，尽管天色渐晚，还有一户人家没走访，吴国良又急着赶去下一户。

匆匆告别后，唐元龙两口刚转身回屋，忽然听到门外一声巨响。“我赶快跑出门去，看见吴国良的车子滚下山崖。”唐元龙说。

“当时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回过神就马上和村民冲下去救他。”当时在场的三家村村委